

古史考

第三卷

批胡适丙编

海南出版社

古史考

第三卷

批胡適丙編

海南出版社

2003 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史考/吴锐等编. —海口: 海南出版社, 2003.11

ISBN 7-5443-1150-3

I. 古… II. 吴… III. 中国—上古史—文集

IV. K21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96836 号

《古史考》第三卷 批胡适丙编

执行编辑: 吴 锐

责任编辑: 野 夫

出 版: 海南出版社

570216 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 2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邮购: 100005 北京市东单邮局 69 号信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

010-65135806 13681522126

<http://www.zgzj.org/gushikao.htm>

E-mail: xinchaoche2003@yahoo.com.cn

印 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毫米 1/16

印 张: 34

字 数: 666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数: 1—1000

ISBN 7-5443-1150-3/K.95

(全九卷) 定价: 1008 元

(Vol.1-9) \$450.00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北京新潮社文化交流公司调换

《古史考》編委會

主 編

彭振坤（湖北民族學院黨委書記、院長）

副 主 編

冉先福（湖北民族學院黨委副書記）

譚志松（湖北民族學院副院長）

張永高（湖北民族學院副院長）

王新勇（湖北民族學院文學院教授）

執行編輯

吳 銳（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

副研究員）

編 委

彭振坤	冉先福	譚志松	張永高
吳吉炎	鄭東艷	王新勇	張芳德
張宏樹	陳發喜	高雁軍	張昇輝
鄭學剛	雷 翔	楊光宗	頓祖義
譚國璽	袁艷梅	蔡清萬	曹 玲
徐定輝	鄧輝煌	王飛霞	譚慶剛
石華富	向吉賢	馮 俐	賴申昊

鳴 謝

我們在編選《古史考》的同時，積極籌劃《楊向奎先生全集》已三年，楊向奎先生家鄉河北省唐山市政府、唐山市豐潤區政府、唐山市車軸山中學為出版《全集》提供了部分資助。《全集》工作最后因故被迫中止，我們借《古史考》出版的機會，對唐山市政府、唐山市豐潤區政府、唐山市車軸山中學表示衷心的感謝。

西北大學文博學院、山東大學文史哲研究院、蘭州大學歷史系也十分關注支持我們的工作。

《古史考》九卷錄排難度大，榮幸地使用了方正集團贈送的方正蘭亭字體 GB 版 V4.0、方正蘭亭字海 V1.00。

弘揚先哲、推進尖端學術研究是我國偉大的文化傳統，謹將上述單位的卓越貢獻記入歷史，激勵後人。

《古史考》編委會

二〇〇三年十一月

《古史考》第一至四卷凡例

- 一、這四卷轉載 1949—1980 年批判胡適的文章，以 1955 年的文章為主。有些文章只是附帶批胡適幾句，有些文章只是介紹與胡適有關的思潮（如實用主義），今一併收入。
- 二、胡適先生照片選自秦風《歷史照片的歷史問題》，文匯出版社，2003 年 1 月，第 76 頁。
- 三、胡繩老院長“永遠要提倡民主與科學”手跡選自丁守和主編《五四圖史》，遼海出版社，1999 年 4 月。
- 四、目錄中文章標題後的年月日是指文章最初的發表時間。文章編排的順序大致按發表時間的先後，但許多文章並不能準確地定位時間。
- 五、這四卷轉載的文章大部分在 1955 年結集為《胡適思想批判》八冊（32 開），由三聯書店出版。結集時不少作者對自己的文章略有修改，《古史考》一至四卷即以此為底本，《古史考》編者按語所說的“原文”，即指三聯書店版的原文。
- 六、這四卷原文的書名沒有書名號，現在的書名號是執行編輯加的。文章名或書名裏面再出現文章名或書名，通常不再用單書名號標出，如出現頻率極高的俞平伯《紅樓夢研究》，沒有統一成《〈紅樓夢〉研究》。層次比較複雜的，則作了區分，如《談〈談談《詩經》〉》。書的章節，作報告、演講的題目，都不加書名號。胡適是開風氣的人物，治學興趣甚廣，而對他的批判更是涉及所有人文社會科學甚至自然科學領域，因而判定一個書名頗不易，一定有不少錯誤，請讀者指正。
- 七、為保留原貌，這四卷保留繁體字。原文簡體、繁體混用，給校對帶來極大的困難，雖然由執行編輯進行了統一，肯定還有不協調之處。
- 八、原文老式字、詞的用法一律保留，如表示“的”的“底”，表示“很少”的“狠少”；許多用語混用，如“思維”、“思惟”，現在也未加統一。包括作者原文“指馬為鹿”，我們認為也沒有必要統一為“指鹿為馬”。
- 九、《古史考》所有文章的標題均位於奇數頁，為了減少空頁，一些偶數頁的行距進行了壓縮。

目 錄

一	胡適反動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一九五五年	李 達(1)
二	肅清科學研究工作中胡適思想方法的流毒一九五五年	任繼愈(13)
三	對批判胡適派主觀唯心主義思想的一點體會一九五五年	吳徵鎰(27)
四	批判實驗主義教育學一九五五年	曹 孚(31)
五	胡適的《嘗試集》批判一九五五年	林 彥(61)
六	《老殘遊記》的反動性和胡適在《老殘遊記》 評價中所表現的反動政治立場一九五五年	張畢來(69)
七	胡適在戲劇文學方面反動的唯心觀點一九五五年	顏振奮(87)
八	批判胡適在民間文學研究上的觀點和方法一九五五年	鍾敬文(95)
九	批判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運動中的 改良主義想思一九五五年	劉綬松(103)
一〇	批判實用主義者杜威的世界觀一九五五年	金岳霖(113)
一一	胡適是怎樣一個人一九五五年	黎少岑(137)
一二	胡適這個人一九五五年	榮孟源(147)
一三	西洋“漢學”與胡適一九五五年	周一良(157)
一四	批判胡適研究歌謠的錯誤觀點和方法 ——兼評胡適的資產階級唯心主義考據學 及其毒害一九五五年	趙衛邦(169)
一五	論考據學在文學研究中的作用一九五五年	陳煒謨(175)
一六	胡適實用主義的唯我論與虛構論的反動本質 一九五五年三月一日	全增嘏(209)
一七	胡適、杜威、羅素是怎樣開始破壞中國的 新文化運動的？一九五五年三月三	陰法魯(215)
一八	胡適——真理的敵人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	黃枬森(223)
一九	學習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 ——“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 講座開幕詞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郭沫若(229)
二〇	評胡適所謂“老杜的特別風趣”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	郭預衡(233)
二一	中國共產黨成立前後馬克思主義者如何和胡適	

	的反動政治主張作鬥爭一九五五年三月十三日	許世華(239)
二二	西北大學和西安師範學院批判資產階級唯心主義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日	新華社(243)
二三	天津文學界批判胡適反動思想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新華社(245)
二四	批判杜威教育思想中的“民主主義”概念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	劉付忱(247)
二五	胡適怎樣利用宗教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三日	王雨田(253)
二六	胡適是怎樣販運杜威教育思想的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四日	韓 落(263)
二七	胡適在抗日戰爭前夕是怎樣媚外和幫兇的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	北 中(269)
二八	胡適實用主義的庸俗進化論批判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六日	艾思奇(275)
二九	實用主義的反動的教育目的論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九日	孟憲承(285)
三〇	實用主義——客觀真理的敵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	章世鴻(289)
三一	徹底清除胡適反動思想對歷史學的影響 ——天津市史學界批判胡適反動史學觀點與方法論 座談會紀錄摘要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日	(299)
三二	批判胡適的思想方法一九五五年	賀 麟(313)
三三	實用主義批判一九五五年	周谷城(319)
三四	批判胡適實用主義思想方法底偽科學性一九五五年	葛 力(325)
三五	胡適《白話文學史》批判一九五五年	李長之(347)
三六	胡適在新文學運動上作用的重新估價一九五五年	鍾敬文(361)
三七	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九五五年	夏 鼐(373)
三八	胡適的“歷史癖”的實質是什麼？一九五五年	王崇武(381)
三九	魯迅和瞿秋白筆下的胡適一九五五年	姚 虹(385)
四〇	充滿毒素的《白話文學史》一九五五年	譚丕模(391)
四一	胡適是怎樣歪曲和污蔑《水滸》的一九五五年	何家槐(397)
四二	《批判胡適的實用主義》一文的修改說明一九五五年	艾思奇(405)
四三	胡適派所謂民主政治的反動的實質一九五五年	黎 澍(409)
四四	看看胡適的“歷史的態度”和“科學的方法” 一九五五年	范文瀾(419)
四五	批判胡適關於憲法問題的胡說一九五五年	張晉藩(443)
四六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和實用主義唯心論的根本對立 一九五五年四月一日	夏甄陶(451)
四七	展開對資產階級唯心主義思想的批判 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一日	人民日報社論(459)

四八	胡適怎樣歪曲了中國古典文學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二日	韓文佑 (463)
四九	胡適文學史觀批判 ——論胡適《白話文學史》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	褚斌傑 (471)
五〇	批判胡適的《井田辯》及其他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	孫力行 (481)
五一	胡適在“五四”文學革命中做了些什麼？一九五五年	以 羣 (487)
五二	胡適的反動文學思想批判一九五五年	黃藥眠 (501)
五三	實用主義的“科學”方法是徹頭徹尾的詭辯一九五五年	何思敬 (523)

• 附錄 •

一	繼續徵求著作權人和繼承人	(12)
二	中國古典學研究動態	
	(一) “王獻唐研究”項目成立	(26)
	(二) 古文獻信息處理技術——方正超大字庫及輸入法	
	 (30、60、86、214、228、232)	
	(三)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編《考古學研究(五)：	
	鄭衡先生七十五壽辰暨從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論文集》	
	於2003年7月出版	(238)
	(四) 洛陽大學東方文化研究院主編《疑古思潮回顧與前瞻》	
	於2003年8月出版	(244)
	(五) 吳銳《中國思想的起源》於2003年9月出版	
	 (246、262)	
	(六) 姜廣輝主編《中國經學思想史》第一、二卷	
	於2003年9月出版	(298)
	(七) 顧頡剛、劉起鈞《尚書校釋譯論》即將出版	(312)
	(八) 顧頡剛等編著《古史辨》將出16開橫排新版	(360)
	(九) 《中國古典學》將創刊	(390、408、450)

胡適反動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

李 達

一、“五四”以前的政治面貌

現在我們來談談胡適的反動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現。胡適的政治思想的表現，大概可以分為“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後的兩個階段來說明。“五四”以後的階段又可劃分為《努力》週報時期、《新月》月刊時期和《獨立評論》及其以後的時期。

胡適自己說，他在美國留學的時候是愛談政治的，但自從選定了哲學做他的專業、文學做他的娛樂以後，暫時不談政治了。

他說：

我是一個注意政治的人。當我在大學時，政治經濟的功課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時間。當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我一面為中國的民主辯護，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時是世界學生會的會員，國際政策會的會員，聯校非兵會的幹事。一九一五年，我為了討論中日交涉的問題，幾乎成為衆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國際非攻論文曾得最高獎金。但我那時已在中國哲學史的研究上尋着我的終身事業了，同時又被一班討論文學問題的好朋友逼上文學革命的道路了。從此以後，哲學史成了我的職業，文學做了我的娛樂。^①

胡適在美國留學的時候究竟怎樣為中國民主作了辯護呢？據說胡適那時對於辛亥革命是持反對態度的。當時留美學生中談到辛亥革命時，他總是用英語說：“我贊成漸進，不贊成革命。”^②胡適的反革命思想原來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 原載《長江文藝》一九五五年二月號。收入《胡適思想批判》第三輯時，作者略加修改。

① 胡適：《我的歧路》。

② 轉引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吳銳按：收入《古史考》第一卷《批胡適

其次，胡適在一九一五年“討論中日交涉問題”為什麼成為“眾矢之的”呢？原來當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準備接受日本所提出的二十一條之時，他看到“留美學生都贊成即與日本開戰”，就“寫了一封公開的信給《中國留美學生月報》，勸告處之以溫和，持之以冷靜”，就是“被斥為賣國賊”，也置之不顧。在袁世凱簽字的次日，他在自己劄記中這樣寫着：“吾國此項對日交涉，可謂知己知彼，既知持重，又能有所不撓，能柔亦能剛，此為歷來外交史所未見。”袁世凱死後，他還深為惋惜，說：“袁氏當是時，內攬大權，外得列強之贊助，儻彼果能利用此千載一時之機會，以致吾國於治安之域，則生榮死哀，固意中事耳。”^①這樣看來，胡適在美國留學時代，既反對辛亥革命，又贊成袁世凱做皇帝，甚至贊成袁世凱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條，寧可不避“賣國賊”的惡名。照這樣，他的反革命的政治思想在這時已經表現出來了。但是當他在一九一七年歸國以後却宣稱不談政治而談哲學和文藝了。他說：

一九一七年七月我回國時，船到橫濱，便聽見張勳復辟的消息；到了上海，看了出版界的孤陋，教育界的沉寂，我方才知道張勳的復辟乃是極自然的現象，我方才打定二十年不談政治的決心，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②。

胡適的話是確實的。他從歸國到“五四”以前，為了“要想在思想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一個革新的基礎”，是曾經“寫過八九十萬字的文章”的。他在思想方面努力宣傳了美國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他除了自己做宣傳以外，還特別邀請了實用主義大師杜威到中國來大做宣傳。據胡適說，杜威在中國講演實用主義達兩年零兩月，講演的地區為遼寧、河北、山西、山東、江蘇、江西、湖北、湖南、浙江、福建、廣東十一省，他的五種長期講演錄發行在十版以上。杜威的講演都是胡適自己做翻譯的。這叫做師徒合演雙簧。他說。杜威在中國講學的影響很大，“我們還可以說，自從中國與西洋文化接觸以來，沒有一個外國學者在中國思想界的影響有杜威先生這樣大的。”又說：“杜威先生真愛中國，真愛中國人；他這兩年之中，對我們中國人，他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對於國外，他還替我們做了兩年的譯人與辯護士。”“杜威先生雖去，他的影響仍舊永永存在，將來還要開更燦爛的花，結更豐盛的果。”^③這是胡適在實用主義思想上替中國政治建築革新基礎的一方面。至於實用主義在中國思想界的毒素確是有的，這是我們今天還在批判實用主義的原因。

甲編》。

① 轉引曾文經：《五四運動前後胡適的政治面目》。

② 胡適：《我的歧路》。

③ 胡適：《杜威先生與中國》。

其次，胡適在文藝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他提倡文學改良，提倡白話文，是曾經寫過一些東西的。特別是宣傳易卜生的個人主義思想，大賣了力氣（曾為《新青年》雜誌編出了易卜生專號）。他率直地承認了易卜生的個人主義代表了他自己的宗教和人生觀。這是胡適在個人主義文藝上替中國政治建築革新基礎的一方面。

由此可見，胡適在歸國以後，“五四”以前，雖然沒有談過政治，却抱着很大的政治野心，要用資產階級的實用主義思想和個人主義文學來建立中國政治的革新基礎，這比較他談政治的影響還要深刻，還要惡毒。但就另一方面來說，這個時期的胡適還屬於新文化運動的右翼，他站在資產階級立場，參加過反對舊文化的運動，在表面上是偽裝着進步的。但歷史的車輪在繼續前進時，胡適就撕去了進步的偽裝，率直地把他舊有的反革命的政治面貌揭開了。

二、由“五四”到《努力》時期的反動面貌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以李大釗同志為首的馬克思主義派，宣傳了馬克思主義，慶祝了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介紹了蘇維埃俄羅斯的真相。馬克思主義派在當時已經取得了文化運動的領導地位，一九一九年的“五四”運動是在馬克思主義派的領導之下爆發起來的。這一偉大的運動，胡適當時並沒有參加。他在“五四”以前，回到安徽原籍辦理他母親的喪事，事後他又到上海住着，等候迎接他的杜威老師來中國宣傳實用主義。所以胡適不但沒有參加“五四”運動，他骨子裏毋寧是不贊成這個運動的，所以他回到北京以後，很擔心“教育一定要瓦解”，勸告學生復課。當中國無產階級大眾在“六三”運動中登上政治鬥爭舞台時，當各種宣傳馬克思主義刊物不斷湧現時，胡適氣急敗壞了。他說：“國內‘新’分子開口不談具體的政治問題，却高談什麼無政府主義與馬克思主義。我看不過了，忍不住了。……因為我是一個實驗主義的信徒，……於是發憤要想談政治。我在《每週評論》第三十一號裏提出我的政論的導言，叫做‘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①他在一九一九年七月寫的這篇什麼導言中，破口大罵那些“不去研究人力車夫生計却去高談社會主義的人”是“懶”，是“阿貓阿狗”，是“新典主義的奴隸”。但他自己却大談個人主義和實用主義，却不算是“懶”，不算是“阿貓阿狗”，不算是“新典主義的奴隸”。他說：“我談政治只是實行我的實驗主義。”“實驗主義自然也是一種主義。……實驗主義注重在具體的事實與問題，故不承認根本解決。他只承認那一點一滴做

^① 胡適：《我的歧路》。

到的進步，——步步有智慧的指導，步步有自動的實驗——才是真正進化。”^①胡適的話說得很明白，他談政治是高談社會主義的人把他激起來的，他談政治是實行他的實用主義。他為忠實於實用主義起見，不能不反對馬克思主義而擁護資本主義，主張那實行一點一滴改良的“淑世”主義。因此，他寧可不避反革命之名，反對馬克思主義。“五四”運動，就我們人民說來，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開端；就胡適說來，是他的反革命歷史的新篇。

一九二一年七月，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是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的結合，它一經宣告成立，就立即發動了轟轟烈烈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革命運動。從這個時候起，《新青年》雜誌變成了公開宣傳馬克思主義和蘇俄實況的刊物，《嚮導》週報則是宣傳黨的主張和政策的機關刊物。工人階級和人民羣眾越來越多地集合於中國共產黨的旗幟之下，革命的潮流高漲起來了。在這個時候，不避反革命之名的胡適更加氣急敗壞了，又要談政治了。他說：“我等了兩年零八個月，中國的輿論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談無政府主義和馬克思社會主義，高談‘階級鬥爭’和‘贏餘價值’。”“……實在忍不住了。我現在出來談政治，雖是國內的腐敗政治把我激出來的，其實大部分是這幾年的‘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的‘新輿論界’把我激出來的。我現在的談政治，只是實行我那‘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主張。”^②胡適所說的“新輿論界”主要地是指《嚮導》週報和當時的《新青年》雜誌說的。胡適在這時候談政治，主要地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中國共產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胡適偏要擁護它們。他在一九二二年五月創辦《努力》週報的目的和動機，正是如此。

胡適在《努力》第二期發表了《我們的政治主張》，宣傳“好政府”主義。他向北洋軍閥政府提出了三個基本要求，即要求一個“憲政的政府”，一個“公開的政府”和一個“有計劃的政治”。他還提出了一些具體主張，如要求軍閥政府和平地實現南北統一，要求召集舊國會制定憲法之類。這是胡適宣傳“好政府”主義擁護封建勢力的一幕。其後胡適看到要求和平統一的計劃不能實現時，又主張北洋軍閥政府允許各省軍閥實行聯省自治。他還向軍閥政府建議，提出了政治和財政幾條平庸的計劃。他自己還說：“一個平庸的計劃勝於沒計劃。”胡適這樣熱心擁護封建勢力，大概也是為了實行他的實用主義，向封建勢力作“淑世”運動的。但結果只落得“向盜賊上條陳”，“實用”是沒有的。

胡適辦《努力》週報的第二個目的是擁護帝國主義。他發表了《國際的中國》一篇文章，反對中國共產黨所發表的一篇宣言。他說那篇宣言中所說的國際帝國

^① 胡適：《我的歧路》。

^② 胡適：《我的歧路》。

主義支持各派軍閥打內戰，“很像是鄉下人談海外奇聞”。他說他自己確實知道英、美、日各國並沒有這一類事，特別是美國決不會和日本攜手共同利用軍閥政府。他說：“我們要知道：外國投資者希望中國和平與統一，實在不下於中國人民的希望和平與統一。”他認為從前外國人所以捧袁世凱皇帝，“大部分是資本主義者希望和平與治安的表示”。他認為美國所發起的新銀行團是為了抵制日本單獨借款給中國，對中國並無惡意。“況且投資者的心理，大多數是希望投資所在之國享有安寧與統一。”“所以我們現在儘可以不必去做那怕國際侵略的噩夢”。因此，他把中國共產黨所說的國際帝國主義者操縱中國金融財政、把持海關、駐屯軍隊、行使領事裁判權、獨佔中國市場、支持各派軍閥等等侵略行動，都認為是“和國內政治問題有密切關繫的。在政治混亂的時候，全國陷入無政府的時候，或者政權操在武人奸人手裏的時候，人民只覺得租界與東交民巷是福地，外幣是金不換的貨幣，總稅務司是神人，海關郵政權在外人手裏是中國的幸事，……所以我們很懇切奉勸我們的朋友們……不必在這個時候牽涉到什麼國際帝國主義的問題。”胡適這樣為帝國主義特別是為美帝國主義辯護，十足地表現他是一個文化買辦。胡適為美國做代言人的效果，比較美國花若干美元在中國做特務工作的效果還要大得多。總之，胡適在《努力》週報上所發表的“政論”，其主要目的，是反對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反帝國主義反封建主義的人民革命。他不但擁護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並且主張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合作，共同壓迫中國人民。這完全是買辦資產階級意識的表現。

胡適曾經見過溥儀，尊稱溥儀為皇上，克盡臣子之禮，事後金梁上溥儀的奏摺中說：“胡適覲見皇上，大受皇上所感化。”可見胡適對於封建殘餘是很擁戴的。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發生後，羣眾反帝國主義的情緒非常高漲，中國共產黨召開中央會議，通過了進一步反帝國主義的策略，號召全國人民起來舉行罷工罷市罷課，並組織了一個行動委員會來領導反帝的三罷運動。六月十一日，上海工商學各界二十多萬人舉行羣眾大會，通過了反對帝國主義的十七條交涉條件。這些條件包括撤退外國在華海陸軍，取消領事裁判權，華人在租界有言論出版結社的自由，工人有罷工自由、組織工會權利等等。但英日等帝國主義者對上海民族資產階級一面以“司法調查”和“關稅會議”相利誘，一面又通過胡適和戴季陶來和它們進行“友誼協商”。胡適等和帝國主義者進行“友誼協商”的同時，買辦虞洽卿乘機修改十七條，並決定單獨停止商人罷市，和克扣各地募交工人的救濟費，壓迫工人復工。因此當時工商學的反帝統一戰綫便被破壞了，這是和胡適的“友誼協商”大有關係的。胡適破壞這個反帝統一戰綫以後，還發表了《愛國運動與求學》的文章，勸學生不要“打倒英日強盜”，說“救國事業須要有各色各樣的人才，真正的救國預備在於把自己造成一個有用的人才”。他又重復了易卜生的話說：“真正的個人主義在於把你自已這塊材料鑄造成個東西”，

喊出了“救國須從救出你自己下手！”的臭調。

三、《新月》時期的反動面貌

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以後，中國共產黨獨自領導着中國人民革命，進行着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在白區方面，蔣介石匪幫統治着廣大地區，白區的黨轉入了地下，表面上呈現了革命的低潮。這時候，胡適認為蔣介石匪幫的政權穩如泰山，很想賣身投靠，因此又糾集了一班人，於一九三〇年創辦了《新月》月刊。《新月》月刊表面上是談文學，實際上是反共反人民，擁護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企圖因此引起蔣匪幫的重視。他對於當時的革命低潮幸災樂禍感嘆地說，他早就在一九一九年發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警告”，“於今隔了十幾年，當日和我討論的朋友，一個已被殺死了，一個也頹唐了。但這些話字字句句都還可以應用到今日思想界的現狀。十幾年前我所預料的種種危險……一一都顯現在眼前了。”他於是約集了《新月》的朋友們討論“怎樣解決中國的問題？”他的朋友們推定他提出一個概括的引論。這“引論”就是他在《新月》上發表的《我們走那條路》的政治論文。胡適在這篇論文中，首先說明要自覺的探路，不能左也不能右。孫中山和共產黨的路，他認為都是不能走的。他要充分用自己的知識，“客觀地觀察中國今日實際的需要，決定我們的目標。”他把這個目標分為消極的和積極的兩種：消極的目標是剷除“貧窮、疾病、愚昧、貪污、擾亂”這“五鬼”，積極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治安的普遍繁榮的文明的現代的統一國家。”他認為這“五鬼”即“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只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他於是找了一些資產階級學者所調查的資料，證實了中國確有“五鬼”存在，因而承認這“五鬼”是革命的對象，就進而說明剷除“五鬼”的方法。他就“進化”、“演進”、“革命”這個概念作了一番煩瑣的混亂的分析以後，認為“打破這五大敵人的真革命只有一條路，就是認清了我們的敵人認清了我們的問題，集合全國的人才智力，充分採用世界的科學知識與方法，一步一步的作自覺的改革，在自覺的指導之下一點一滴的收到不斷的改革之全功。不斷的改革收功之日，即是我們的目的地到達之時”。他認為這樣的路子也許是“最快捷的路子，也許人家需要幾百年逐漸演進的改革，我們能在幾十年中完全實現”。胡適這一段反革命的夢話，他自己還誇稱對社會國家負了“重大責任”。“兢兢業業的去思想”過的哩。

胡適那些反革命的夢話，是博得了蔣介石匪幫的重視的。胡適還前進一步，

像煞有介事地批評過蔣匪幫政府，如說蔣政府“不肯建立監察制度，不肯施行考試制度，不肯實行預算審計制度”，並主張制定約法憲法，實行“專家政治”之類，都是略帶批評而類似上條陳的東西。不久，蔣胡之間默契成立。《新月》停辦了。胡適除了榮任美國退還庚款所組成的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的董事外，又榮任了東北政務委員會委員，農村復興委員會委員，中英庚款委員會委員了。胡適加入蔣介石買辦集團了。

四、《獨立評論》時期的反動面貌

胡適加入蔣介石買辦集團以後，為了效忠於他所屬的集團起見，就糾合了蔣廷黻、丁文江等一些反動分子，在一九三二年五月（“九一八”以後八個月）辦起《獨立評論》來了。這個《獨立評論》辦了四年多，出了二百多期，發表了一千多篇文章。它的宗旨，據胡適說，“在這最嚴重的時期，我們只能用筆墨報國，這本來是很無聊的事”。辦《獨立評論》雖說是“很無聊的事”，却也有幾點值得提倡：（一）“獨立的精神”：發揮特立獨行之士的精神，虛心，公道，尊重事實，排斥“時髦的引誘”（即排斥反帝反封建的主義或成見）。（二）“反省的態度”：“我們今日所受的痛苦和恥辱，都是過去種種惡因種下的惡果，……必須自己認錯了，然後肯死心塌地的去努力學上進。”（三）“工作的人生觀”：“趁現在中國還是我們的，我們正應該起日暮途窮之感。雖然我們覺悟已經太晚了，也許神明之胄，天不絕人，靠我們今日的努力能造了復興的基礎。說到極點，即使中國暫時亡了，我們也要留下一點工作的成績，叫世界上知道我們還不是絕對下等的民族。”^①照胡適所說的看來：《獨立評論》的宗旨是他和他的同道準備在國家將亡的時候，用筆墨搞些“無聊的事”作為工作成績，以便在亡國以後不被世人看做是“絕對下等的民族”。但他們雖然在作亡國的哀鳴，却仍念念不忘反蘇反共反人民。例如反對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反對蘇聯的報導以及把人民比作“五鬼”化身的文章，都屬於這一類。其次是擁護蔣介石買辦集團；例如那些談到外交內政和文化的文章，都是向那個集團上條陳的東西，並且還貫徹着反共的精神。胡適在這個時期的政論，主要地堅持了他的亡國路線。他在“對日外交方針”中主張蔣政府依據日本在國聯提出的五項原則進行交涉，主張解除東三省軍備，在關內的東三省軍隊應該逐漸編遣，日本人可在東三省租借土地，“中日兩國締結新條約，不但應該解決積年久懸的爭端，並且應該遠矚將來，確立遠東兩大民族共存共榮的基礎。”他在“九一八”周年寫的《慘痛的回憶與反省》中，

^① 胡適：《獨立評論一週年》。

又把祖宗責備一番，說“我們的老祖宗造孽太深了，禍延到我們的今日”，自己如不長進，如不剷除病根，什麼都說不上，因此，他希望國民黨造出一個重心來。當國聯調查團李頓報告書發表主張國際共管滿洲時，他讚美那個調查團的“審慎的考查，公平的判斷。為國際謀和平的熱心”，“值得感謝和敬禮”。因而他認為這是“一個代表世界公論的報告”（這是他那篇文章的題目）。後來“滿洲國”成立了，他在那篇《全國震驚以後》的文章中說：“我們今天最大的教訓，是要認清我們的地位，要學到‘能弱’，要承認我們今日不中用，要打倒虛驕誇大的狂妄心理，要養成虛懷顧學的雅量，要準備使這個民族低頭苦志做三十年的小學生。”他又寫了《我們可以等候五十年》的文章，主張對“滿洲國”採取“不承認主義”，且等五十年再說，“在一個國家千萬年的生命上，四五年或四五十年算得什麼。”阿 Q 臨刑時說過，再等十八年就是好漢，胡適的說法和阿 Q 完全一樣。他始終不承認美國夥同各國宰割中國的說法，他反對那種說“國際帝國主義用政治外交方法解決滿洲由日本獨佔或由國際共管”的說法，認為這是“杜撰”和“無識”。他贊成蔣廷黻的說法：“華府會議以後，在華只圖通商的國家，切望中國的自強更加熱烈，有時比中國人過而不及。”

往後日本提出了所謂“廣田三原則”之時，胡適就寫了一篇《調整中日關係的先決條件》一文，由不承認“滿洲國”變為承認“滿洲國”，而只主張“保全華北”了。當“何梅協定”締結以後，何應欽把一些軍政機關靜悄悄地從北京撤退了。胡適看到這種情況，就寫了《沉默的忍受》一篇妙文說：“在這沉默的忍受的苦痛之中，一個新的國家已漸漸形成了。能在這種空氣裏支持一種沉默，一種鎮靜，一種秩序，這是力量的開端。……這是國難的訓練，這是強鄰的恩賜，……多難興邦的老話是不欺人的歷史事實，我們不必悲觀。”這真是亡國奴才的夢話。“何梅協議”是蔣介石匪幫答應從華北撤退進而把華北讓給日本的一種密約，它所以靜悄悄地撤退軍政機關，完全是害怕人民羣眾起來反對。這完全是蔣匪幫賣國的勾當，而胡適却認為“民族國家已漸漸形成”，“我們不必悲觀”，這完全是欺騙人民的賣國者的口氣。

胡適對於日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始終是主張逆來順受的，始終反對反抗。他在《我的意見不過如此》中說：“我不能昧着我的良心出來主張作戰。……我自己的理智與訓練都不許我主張作戰。”（據說胡適在“七七”事變前夕，曾加入南京的低調俱樂部反對抗日戰爭，這是可信的。）他認為“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不能隨便開口主戰。他的個人主義是主張要對“大我”的無窮過去和無窮過未來負責的，所以當着亡國的時候，只有自怨自艾，努力工作，做一個有成績的亡國奴。當時上海幾個報紙曾登載了反對他的新聞，還有一批女國民通電聲討他，說他是“異族胡適”，是張邦昌，是李克用，這聲討是完全正確的。

胡適這類亡國主義的主張，大概是受了秦檜的影響了。胡適在一九二四年十